

74.03
DIANDONGNAN
WENSHIZILIAO

第八辑

90



黔东南文史资料



黔 215/17

黔东南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一月

封面设计 蒋志伊

封面题字 陈恒安

主 编 况再举

副 主 编 黄寿华

责任编辑 吴少祥

黔东南文史资料

(第八辑)

黔刊资字第04B—90—008号

环宇联印厂承印

工本费2.00元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主 任（缺）

副主任：罗竹香（兼） 罗义群（兼）

委 员：黄家骥 姚 智

目 录

三八水银厂兴衰亲历记·····王其井口述 王凤刚整理	(1)
锦屏匪叛时巨额人民币的保存经过·····文启宇	(10)
邛水协兴油桐公司·····王国华整理	(13)
民国时期施秉合作事业侧记·····高中元	(17)
解放前麻江货币流动变迁记略·····	
·····向景云供稿 州文史办整理	(25)
“四·九”三穗金库大案纪实·····吴展明	(29)
民国时期的施秉林业·····杨祖芳 谢国用	(38)
三穗印刷话今昔·····尚永杰 李光厚	(44)
黔东南大学始末·····龙连荣	(48)
解放初期施秉县机关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回忆	
·····杨芳祖	(57)
大中小学创建的回忆·····罗寄帆	(62)
省立台江国民学校师资训练所概述·····任广林	(74)
贵州省立镇远师范学校的一段回忆·····吴才俊	(79)
清代锦屏的集资办学·····姚炽昌 欧阳克俭	(86)
石 桥 沧 桑 七 十 年	
——记镇远新大桥从议修、建成到加宽·····黄荣祺	(96)
三穗飞机场始末·····万国胜	(101)
修建天柱飞机场概述·····天柱县政协文史办	(106)

麻江寺庙概述·····	陈廷松 (110)
在凯里地区搞策反工作的回忆·····	吴道华 (120)
凯里战斗记述·····	吴道华 (126)
第十九临教院在施秉·····	高中元收集整理 (135)
兵 连 祸 结 古 城 澗	

——王犹之战蹂躏镇远散记·····黄荣祺 (141)

三穗地方势力与省保六团火拼事件

·····毛老三口述 龙连江 毛继屏整理 (151)

战时西北巡回教育班见闻·····黄泽远 (154)

黄平哥老会开山设堂与苗民暴动·····州文史办整理 (162)

重安教案始末·····文史办公室搜集整理 (170)

雄 山 秀 水 育 英 才

——苗族共产党员赵正学传略·····陈 森 (173)

爱国民主人士梁聚五先生·····况再举整理 (176)

乐森珣教授生平事略·····黄寿华整理 (186)

辛 勤 的 园 丁

——回忆许敬森老师·····许士仁 (191)

乐嘉藻传略·····石国梁 时宏深 (199)

熊凤铎·····甘国盛 (203)

麻江武术大师向吉权·····甘 辛 (208)

夏华在麻江高视组织游击队二三事·····

·····罗锡寿搜集整理 (202)

关于吴会贤先生族别的更正·····三穗县志办 (218)

三八水银厂兴衰亲历记

王其井口述 王凤刚整理

按：丹寨汞矿业历史久远，仅从所见资料看，在宋、元时代即有开采。到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清庭对汞业实行极课解缴时，部分地段已是“洞老山空”。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成立“青溪八寨矿务商局”，吸收英法资本，重新开采丹寨、铜仁等处汞矿。此后，丹寨汞矿业一直没有停息。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三（都）八（寨）厂”（事务所），则是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直接在贵州办的四个采汞业事务所之一（即铜仁、三八、贞丰、务川事务所）。解放后，国家在丹寨期立了大型的汞矿采冶企业，“丹寨汞矿”名列全型五个特大型（万吨级）汞矿中的第三位，在全国冶金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王其井老人的这段回忆，对于帮助今人了解“三八厂”的始末、规模、组织状况和生产水平，接供了翔实、具体的资料。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七月到三十三年（1944年）冬天，省里在我们丹寨县金钟乡高排村的“大发硐”开办三八水银厂^①，我在厂里当了五个年头的矿工，亲历了该厂兴衰的全过程。现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回忆出来，供后人参考。

一、三八厂及其之前的开发简况

听老矿工和老人们说，大发硐一带生产水银朱砂有几百年了。距今十一代的本宗、名声赫赫的往依祖公，就曾收留了躲在“槽子”（矿洞）里避难的缺耳朵汉人。六十多年前我刚记事时，时常看到老人们去打硐采矿砂。我长大以后，在大发硐及其周围的扬武乡朱砂厂、干改、三都县交梨乡冷饭厂、乌腮沟一带，见到的陈年老“槽子”就有二十八口，其中分布最多的是在大发硐这个山沟里，最深的是鸿发硐，有百多丈，在槽子尽头可以听到头顶传来高寨村的春碓声（硐口到高寨的山路有一公里多）。

听老矿工说，开发最早的是鸿发硐和大发硐，他们能记得姓氏的最早开厂人是姓余的“广佬”（即本世纪初在此经营的广西人余通和、余胜和兄弟）。后来是县城的张印堂接开鸿发硐，他的儿子张二生就干脆定居在高寨，好就近管厂。此外，县城十字街的何玉珊，三都交梨王家寨的王虎平等人也在这里开过水银厂。他们都发了大财。

三八厂开办后，首先打下乌尼厂，以后才陆续增打大发硐、羊子硐、鸭子硐、晒宝厂（又称“塞保厂”）、上乌尼厂、冷饭厂、四象厂等处。其中开采时间最长、投入人力最多的是晒宝厂。大发硐和羊子硐开采一年左右就停了。那时还有孔正伦两兄弟、王其中三兄弟、刘体和、杨老乔、苏老大等私人在鸿发硐和天心厂等老槽子开采。当时，本县老八寨人秦绥之^②在三八厂当“工程师”（到打晒宝厂时称作“工程师”），一个姓郭的外省人当“事务员”。在我们的印象中，厂里的具体事情都是他俩管的。

二、矿 工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我二十三岁。那时节国民党政府抓兵派伕很厉害，插秧刚上坎，保里就集拢我们壮丁天天操练，随时应付抓兵派伕。我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要是被抓了兵，家中就没有依靠了。恰好公家正开始在大发碛开办三八厂，并说当了厂里的矿工就可以不去当兵和免出伕钱，于是我就到大发碛去问。有人指给我一个小木房，说那里就是厂的办公室，叫我去找秦绥之工程师报名。我到那里找到秦绥之，请他收我做工人采“砂子”（当时民司都称采矿石为“砂子”），他照例问了姓名住址，告诉我进了厂就不准辞工，不准逃走，问我愿意不愿意。我说愿意。（以后我们才认识到这个条件使我们在健康严重受害时也不能摆脱。）他就给我登记，叫我回家去带被子衣服等日用物品来上工。后来我知道，矿工们进厂手续跟我一样简单。

我在古历七月进厂后，先是当伕夫，后来当杂工。到了旧历年，保里通知我被抽当兵，秦绥之就叫我到县城一处的房子躲避，又从厂里借了八十块大洋给我交兵钱（以后在厂里干了一年才扣还清），才打脱了这次抓兵。过了年后我就回到厂里，在羊子碛先当抽水工一个月，接着当炮工约一年，又转到晒宝厂当抽水工两个月，然后就一直当了两年多的炮工，直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春耕大忙时节我找了个理由回家为止，一共在三八厂干了五个年头。

我刚进厂那阵，全厂工人只有二十多人。到打羊子碛时，已增加到七八十人（不包括离厂部十来里路的朱砂厂鸭子碛那边的工人，下同）。到打晒宝厂时，达到二三百

人。这些工作有的是家道艰难来找碗饭吃，有的是为了躲避抓兵。象厂部驻地大发硐寨，有十多户人家无田无地，才来这里落脚，专门靠采矿淘砂过生活。

工人们吃住在厂里。住房是破烂的工棚，房顶盖的是杉木皮，四壁围着野竹竿，通风漏雨。吃的原来是由各人交米，集体煮吃，后来米价大涨（1940年一元大洋能买一斗米，后几年涨到六元大洋一斗），许多工人吃不起大米，就各煮各吃了。

工人主要分为伙夫、杂工、炮工三个工种。伙夫负责给“先生”和工人办伙食（工人对厂里的监工以上的职员都称为先生），每月工钱开始是36元“纸洋”（即法币，当时相当九元大洋），两年后由于物价上涨，加到80元。杂工的任务是运出“砂子”（汞矿石）和“荒〔fāng〕子”（不含汞的石头），锤“砂子”，挑运水银，参加“烧灶”（冶炼水银）和抽除硐内积木等，工钱同伙夫一样。炮工负责打炮眼、装药、放炮、烧灶等，每月工钱开始是40多元纸洋，两年后加到120元。工钱每个月发一次，到郭事务员那里去要。

工人没有星期天，开始时只做白班，也没有规定劳动时间，反正天亮干活，天黑休息。后来打晒宝厂时“发厂”（遇到大矿层）了，工人就搞三班倒了。

工人如果发生工伤，厂里给医治，也给伙食费。有一次炮工王治伦被石头砸断脚，秦绥之就叫厂里开钱给来医治的草药医生。

在大发硐这边劳动的工人，几乎全是厂子周围的排谈（今高排）、大发硐、羊乌（今五一）、把条、排廷、朱砂厂、干改、排和、岩寨、羊甲、黄泥坡、新塘、洗马塘等寨

子的苗族和水族农民。仅我们高排村参加的就有30多人。矿工们由于生产生活条件很差，加上中汞毒，牙齿松动甚至脱落，身体瘦弱，许多人后来中年壮年丧命，活到现在的已是屈指可数了。

三、采矿

三八厂虽说是“公家”办的厂，采矿仍然全部是手工作业，油灯照亮，手锤打眼，火药放炮，人力运矿，竹筒抽水……样样都沿用古老的方式方法。

每个炮工都发给一盏桐油灯、一把手锤、四根钢钎（长短一套），由自己保管使用，丢失要赔、点灯用桐油不限制，各人随时可添。手锤重三四斤，圆柱形，头弯口小，叫做“跳锤”。钢钎叫做“炮杆”，对损耗有限制，厂里一个月过秤一次炮杆，损耗二三斤以内算合理，如果超过，就怀疑拿去私用，要折算价钱扣工钱赔。所以炮工在使用和修理炮杆时都很小心。炮工都是自己掌杆自己打锤，不象现在由两个人合作。

开初，厂里规定每个炮工在一个工班内要打二尺指标的炮眼，并自己完成装药放炮，后来加到打三尺的炮眼。打两个“小炮”（炮眼深一尺）或一个“大炮”（炮眼深一尺五寸以上）都可算达到二尺指标，打两个“大炮”可算三尺。打好炮眼后，要经过监工来检查登记才能装药。如果发现打不足规定的指标，就要折扣工钱。负责检查炮眼的监工，一个是姓洪的北方人，一个是姓林的本地人，后者是秦绥之的姑爹。放了炮以后他俩又来检查“炮底”（残存的炮眼）情况，如果炮底剩下五寸以上，就要补打一尺的炮眼，否则扣

工钱。那时候没有炸药，都是用土硝和木炭熬造的火药，爆炸力不强，常常炸不登炮底。一个炮工一个工班平常不过生产二三百斤矿砂。为了少遭补打炮眼或扣工钱，炮工们终于想出办法来对付检查：在装药前先用打眼的石碓回填一小截炮底孔，这样爆破过后不论炮底剩下深浅，均与掌子面几乎一致平，监工来查看效果时，用铁条（上面有刻度）往炮眼一插，即使炸不登底也插不进去，于是就都“合格”了。

打硝时每个工作面五个人，先打完炮眼的就提前休息，等大家都打好了才同时装药放炮。每个硝都指定有工头领班干活，大家称他们叫“管事”。“管事”都是些有点采矿经验又会打铁的炮工，打钝了的炮杆都交给他们修理。他们也都是本地农民。我在大发硝干活时的管事叫王治富，水族，二十五六岁，排谈村人。在羊子硝时的管事叫王治邦，水族，也是二十五六岁，排谈村人。在晒宝厂时的管事叫王鸟戛，苗族，三十出头，排廷村人。

三八厂开采的硝中，矿层最大，出“砂子”最多的要数晒宝厂了。这个硝已不知道是哪年哪个老板先开采的，我们去打时，硝子已经有十八丈深了。传说以前有人打这个硝发了大财，搬银钱出来晾晒，所以得名晒宝厂。我们打别个硝时，多遇到“烂夹砂”（不连续矿体），往往打得几天的“砂子”后就要打“荒子”，大家称这种开采情况做“撵烂夹”，而打晒宝厂时，有一次连续打了好几个月都还没有打完“砂子”，而且水银成分很高，有时一炮炸下来，地下红乌乌一片，尽是岩朱砂。刚办厂那阵，一斤水银在县城才卖五块大洋，到民国三十三年已卖到十四块大洋一斤，不晓得开厂的发了多少财！

那时三八厂在三都县交梨境开采的冷饭厂（硐名）还经常打出活水银（天然纯汞）。

在打硐中常常遇到出水，所以也少不了抽水排水。那时厂里没有铁管子，更没有抽水机，都是用一两丈长的竹竿打通竹节做成抽水筒，用人工抽水。打晒宝厂时碰到出水，由于硐子深，用了九根长竹筒连成一条龙来抽，我被派去抽水两个月，屁股都差点坐烂了。

那时矿工普遍有迷信思想，为了避免发生各种人身伤害事故，保佑平安，工人在每个硐口都竖着几块石头作菩萨，久不久就凑钱打平伙“敬菩萨”，安慰自己。

厂里对“砂子”和水银的生产过程管理不严，工人进出硐无人检查，烧炼水银也无人监督，要想偷“砂子”或水银，是不容易发觉的。但是那时工人都挺诚实，加上在我们民族心里和舆论上特别鄙夷和憎恨偷窃行为，所以我在厂五年从没有听说发生偷窃“砂子”或水银事件。

四、冶 炼

那时冶炼水银叫做“烧灶”，三八厂采用的仍然是古老的工艺。在地上砌两个连通的土灶，灶孔高一尺左右，上面安上两口冶炼水银专用的碟形铁锅，装入“砂子”，倒扣上两只小陶缸（称为盎罈），缸沿用冶炼过的砂渣填紧不使漏气，然后就可以在灶孔里烧起柴火冶炼了。这种平底“水银锅”是本地老八寨铸造的，锅底厚二指头，锅口宽二尺多，可以烧两年不坏。每口锅每次可以装入二十斤“砂子”。

“砂子”必须捶细如米粒状才好烧炼；如果太细成了粉末，就容易“糊锅”，过于粗大又难于烧透，出不尽水银。用这

种烧灶技术，一般含量的“砂子”一锅只能出水银一两到半斤。每烧一个多钟头，就试朝盎罈上吐口水，如果口水不粘盎罈而立即滚落下去，表明温度已到，水银已经炼出了，就可以揭罈（称为“扒盎”），待其冷却后，将盎罈内壁上的水银灰扫去小容器，加水数滴反复搓揉，即可得水银。扒盎后立即换上新“砂子”，拿另外的盎罈去盖上又烧。烧炼含量高的“砂子”时，要扒盎七八次才换一次“砂子”，这种“砂子”十斤可以出水银四到五斤。我曾经烧灶一天一夜就得二十多斤水银。

三八厂在厂部砌有三口烧灶，每口灶安两口水银锅，这就是“冶炼车间”了。冷饭厂那边的“砂子”都挑到这里来冶炼。

烧灶原来是由杂工干的。打晒宝厂出“砂子”多，烧灶是连续作业，毒气（汞蒸气）又大，光由杂工干身体受不了，从那时起炮工也轮流参加烧灶。七天左右轮到一次（一班），每次负责烧一天一夜。负责给烧灶工人发“砂子”和秤收水银的人叫余干成，是羊乌（今五一村）人，他是秦绥之儿子的“保爷”。由于他天天在烧灶旁边办事，中毒太严重，不久就毒瞎了眼睛，双手也颤抖不停，解放后不久就病死了。余干成用个木盆印“砂子”给烧灶的工人，不过秤，一盆有四十斤左右，正好够一口烧灶的两口锅烧一次。每次扒盎，所得水银暂用荆竹筒盛着，到交班时再统一交给他过秤登记，然后倒进陶缸里。等到要挑去县城交卖时，再装进小铁罐里。一罐水银荆一百斤老秤，合现在的一百一十五斤九两四钱。

三八厂的水银都是抬到县城西门方家交，后来抬到县城

吊井边刘体和家交。那时厂里租他们的房子办公，有一个叫曹工程师^③的和几个办公人员就住在方家那里。曹工程师一口外方话，经常从县城到厂部来，有时也下洞察看，后期不见他来了。

打晒宝厂的时候，有一天，秦绥之叫我和另外三个工人带两副滑杆去县城接两个当官的，这俩人都是大高个子，讲一口外方话，穿着呢子衣服。有一个很同情我们，经过寨子时才让抬着，路上都是自己走。秦绥之和郭事务员跑出老远来迎接，称他们“局长”。他俩当晚还到大发硐和上乌尼垌去察子，派我给他们燃起杉木皮火把照亮。第二天又派人抬回县去了。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冬，日本军队由三都方向打到丹寨。在此之前，厂里大小头头都跑了，厂子无人管，工人也散伙了，三八厂也就垮台了。

注释：

①1940年7月，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贵州采务局接管三都八寨各处采矿，设立“三（都）、八（寨）厂”厂部在大发硐。1941年黔川湘合设采业管理处，该厂改称“三八事务所”，但群众仍称三八厂。解放后，国家在这里建立了成为全国五个特大型采矿之一的丹寨采矿。

②此人长期担任丹寨县政府建设科长。

③此人是三八厂主任，名叫曹修新，湖南人。

锦屏匪叛时巨额人民币的保存经过

文 启 宇

锦屏和平解放不久，旧军官龙俊生等人突然发动武装叛变。解放军在城里的人不多，奉命撤退。有关领导将五大包未启封的人民币交给文宏祥保存。锦屏再次解放时，文宏祥又将这批人民币原封不动地交还人民政府，从而在锦屏的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文宏祥是个普通木商，随时有被土匪敲榨勒索的危险。他之所以冒着被查抄、牵连的危险接受这一请托，因为他知道家族中几个有一定政治背景且为人正直、政治态度较开明的人会支持他。事实上，这批人民币几经转移，确是文氏家族中的许多人及亲戚共同支持、保护才得以保全的。我的父母是保护这批人民币的参与者，我是此事的目击者。

这批人民币最初曾在我家存放了一段时间。那时我家与文宏祥共住王家祠对面的“黔东别墅”，共用中间的堂屋。房产为外地某资本家所有，归文宏祥支配。文宏祥接我家同住一屋，一方面是出于家族情谊，一方面是为了在身边安一尊保护神。因为家父文蔚赤早年追随王天培将军北伐，后又在国民政府任职多年，弃官回乡后，尽管两袖清风，但由于资历和为人耿介，在地方上颇有些名气。母亲黄爱光也曾参加过北伐。锦屏和平解放后，王天锡先生曾引荐家父会见张武云县长，而且，甘凤章、王天锡两位先生曾到家中约家父

赴省参加人民政权工作，家父因病重而未能同行。文宏祥对我父亲的政治态度有所了解，所以便将这批人民币搬进我家保存。

记得是1950年一个初春的夜晚，我正准备睡觉，突然见文宏祥等几人搬着几大包东西从堂屋进入我父母住的前屋，再穿过我住的后尾进入侧边存放东西杂物的房间。在昏黄的茶油灯光下，气氛神秘，人们的神色都很紧张。出于好奇，我便跟进去看。只见大家七手八脚地将米桶里的米倒出来，把几包东西放进桶里，然后再把米倒回去。原来只有小半桶米，顿时变得几乎满桶。我父亲皱了皱眉头说：“不行，只要用竹签子一插就露馅了。”忙乱中不知是谁主张放到地板下，于是有人动手撬开了两块地板，这几包东西又被放到地板下面。有人用大钉子把拆过的地板钉牢。我母亲说：“这钉子一看就知道是新的，容易引起怀疑。”接着又有人从炉子里抓来一把灰放在钉子上，用脚搓了好久，钉子就不怎么显眼了。

那天晚上，由于紧张、奇怪、兴奋，我上床后好久睡不着，嘴里不便问，但心里明白一定是解放军留下的什么贵重东西。后来才从大人们谈话中知道那几大包东西全是钱。那几包钱不仅在一个儿童的眼里是很多很多的，就是后来的三十多年中我也没有亲见过这么多捆扎在一起的钱。数目有多少，我难以估计。

这一晚，文宏祥也很紧张。据我母亲回忆，文宏祥躲到王先德家（王家祠侧的第三幢屋）住了一夜。连续几天无事，大家的情绪才稍微安定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我母亲提出这几包钱放在地板下既怕老